

社会学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毛泽东同志社会研究方法论初探

-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顾晓鸣(1)
- 试论理论社会学的地位问题……………庞树奇(23)
- 论社会学的直接应用性和普及性……………胡申生 刘达临(37)
- 社会学：一门对社会进行整体研究的科学
- 对社会学的对象及其
- 学科性质的探讨……………赵善阳 郑 晨(45)
-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吴 铎(55)
- 浅谈城市社会学……………麦 夷(83)
- 试论劳动社会学研究……………李 平(90)
- 读毛泽东同志关于家庭问题的一封信……………邓伟志(102)
- 苏联婚姻家庭法的改革及其后果……………朱有钰(111)
- 上海解放初期的妓女改造工作……………陆绯云 张钟汝(121)
- 正确对待子女的恋爱婚姻问题……………周立群 陈文歧(137)
-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住宅建设的若干问题……………夏 杰(143)
- 突出的社会问题——住宅紧张原因浅议……………孙金楼(151)
- 研究职业声望的社会意义……………蓝成东(157)
- 上海市苏北籍居民社会变动分析……………吴良蓉(170)
- 要发动全社会关心老年人问题……………袁缉辉(191)
-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与心理卫生……………时蓉华(198)
- 西方社会老年学的发展……………沈 健(216)
- 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人口问题……………姚国础(226)
- 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仇立平(234)

社会指标体系的理论分析·····	范伟达(243)
谈谈我国的社会工作方法·····	卢汉龙(256)
略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与任务·····	王小真(267)
社会工作与优生·····	蒋永康 黄渭梁(282)
苏联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演变·····	刘海善(293)
谈谈自由时间·····	金宗美(298)
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初探·····	陶慕渊(310)
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的个体劳动者·····	王传贵(319)
中年知识分子业余生活调查·····	吴锦芳(326)
马克思·韦伯著作介绍·····	蒋永康(331)
城市社会生活对两代人关系的影响·····	江维娜(341)
试析居民委员会的群众性自治性特点·····	胡增耆(351)

毛泽东同志社会研究方法论初探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顾晓鸣

一、研究这一问题的迫切性

随着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各行各业面向实际，调查现实的问题已蔚为风气。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地综合地研究现实社会的科学，应当提供给人们怎样有效的科学工具——社会实际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呢？社会学应当在自己的专业性的调查研究中作出怎样的范例？又应当如何把自己的社会研究同各学科各行业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适合于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呢？

目前的情况是，社会学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经验研究，人们一方面感到国外那些在书上写得井井有条的方法在实际调研中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却往往又认为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未必适合于现代如此复杂的社会。大量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成果是散在的，结论往往是人所共知的，由于这类社会资料的采集和加工过程的不够精密，因而它们的保存和再利用的价值比较低。不少调查研究主要提出了一些问题，描述了一些现象，而未能发挥研究工作预测未来的科学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根本功能在于：“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敢于从事实活动以实现未来。”^①应当是为了找到“行动的向导”去进行研究的。从这个根本问题上思考一下，我们会感到，现在包括美国苏联出版的东西在内的社会学著作中似乎都缺少了点什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论具体的调研方法、工具、设备和人力及其组织程度，现在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那时候都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单就预测手段来说，就有情景展望法、交叉影响分析法、德尔斐技术、自我想象转变法等直观判断方法，以及包含着名目繁多的技术的主要指标方法（预兆法）、趋势外推技术、随机过程、因果模式、规范性预测、分割（多重分类、组合分析、组元分析）法等等。然而，就在产生这些“科学方法”的西方，力量雄厚的社会学专家队伍却无法预测自己社会的未来，以至于在美国正统的最大权威之一英克尔斯主编的权威综述性年鉴《社会学年评》1982年这一卷中，述评近年来社会预测成果的权威人士 R·L·亨歇尔说：“当前，社会学大大放弃了它的潜在预测的作用，而由其他学科来填补这个空白。”这种情况，是西方社会学危机的表现之一，也是批判社会学对实证社会学猛烈抨击的论据之一。然而，在没有如此复杂的“科学预测手段”时代的恩格斯却曾相当精确地预测了距他逝世还有二十年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体局面和结果；在图书资料条件如此匮乏、情报手段如此简单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却精确地预测了根据地的形势发展、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以及整个解放战争的变化趋势。这一切使我们感到，在那一切发达的“社会学方法”之上，还应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才能使社会研究或社会学研究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

许多作者都指出，这是由于西方缺乏一个正确的总体理论而造成的，因此，在具体社会研究中不能不陷于“粗俗的经验主义”。而我们，则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作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的。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般来说，苏联广大社会学家还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他们的著作中，不断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

主要组成部分的论点，然而，这并没有自然地使他们的经验研究摆脱经验主义的侵蚀，许多权威人士提出了批评。“1967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在深刻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到目前为止，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尚未得到足够广泛的开展，这些工作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仍然是充满经验主义的……许多著作没有包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结论、新总结和新建议。’”②1980年出版的《辩证法和社会学》一书中，1968年至1977年曾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研究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M·鲁特凯维奇批评说：“六十年代苏联社会学出现经验主义扩大化那样一种‘幼稚病’的症状，这说明了部分科学工作者无批判地借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经验，没有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③由此可见，一般化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能有效地抵制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袭，并不能使具体的经验研究上升到科学的高度。让我们以这两本力图批判和克服苏联社会学研究中经验主义倾向的著作为例，更深入一步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引用苏共中央决议的那本著作是1976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著的《社会学家手册》。在这本自称是弥补“能够完整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这门科学、它的对象、方法、社会职能以及进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的著作的空白的书中，尽管正式宣称“这本著作以通俗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④但是，只用了十页多一点的篇幅笼统地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对象、理论和方法论”，而讲方法论的部分连小标题也没有，除了极其简略地谈了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方法论

外，几乎没有讲到社会学本身的方法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力主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主要部分”以及“三层次”的这些作者，在一本五百页的著作中，只用了三十几页谈了全部的“理论社会学”，用了五十页左右谈了“苏联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向”（还不是系统的专门社会学！）其余五章（全书共七章）竟然全是具体调查的组织、统计、测定的具体方法！而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理应归入“社会统计调查”这一科目里去的。作者用复杂的程序和数学公式来计算被征询者回答的“满意”“不满意”之类，却丝毫不说明何以能在方法论上保证回答者说的是真话、保证所有回答者对“满意”、“舒适”、“好”之类的日常语言保持一致的理解。同时，对这些繁复的资料如何才能上升为理论的问题，说的多半是技术性问题。结果，这样一本全面的社会学著作中，实际上既没有充分阐述“总体社会学”及其对其他两层次的指导意义和途径，也没有“专门社会学”，更没有专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这本看到本国经验主义倾向的著作并没有摆脱经验主义幼稚病，倒是这种带有教条主义气味的科学幼稚病的一个样品。《辩证法和社会学》一书目的是阐明马列主义哲学同社会学的关系来医治这种经验主义幼稚病，然而，它的六章中只有一章用来谈“唯物辩证法对社会学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对于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论只停留在教条式的泛泛而谈上。

这是前车之鉴。我国社会学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类似的经验主义的倾向。其原因是，客观上，社会愈益复杂，每个研究者的范围和可以获得的材料同社会整体相比总是过于狭小；近年来偏重理论演绎的研究方法突然转向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人们理论准备和技术准备都不足，不免有片面性；加上社会学学科不成熟，外国的方法在短期内一下子

介绍进来，我们在借鉴利用这些技术时难免有粗糙和生搬的情况。主观上，我认为，在于我们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的指导作用，而对于社会学学科的真正科学化、现代化究竟从哪儿着手，没有深入思考和讨论。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依靠国外现代化研究技术和苏联的某些理论结论来规划和构想我们自己的社会学的倾向。我认为，借鉴西方和苏联的社会学成果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这一切必要的工作之上，还有一个决定性工作，这就是要找到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

这个根，就是我党社会研究的优良传统。六十多年的社会改造活动已经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些研究的科学性，证明了其中含有极其丰富宝贵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宝藏。这些理论和方法论已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著作之中。但由于它们往往散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篇章中，加上没有专门的社会学学科持续不断地把它们转为条理化的学科内容。因此，人们有时会忽略了它们，有的同志甚至会产生我们以前没有社会学（指专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误解。其实，只要想一下，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社会学，我们怎么能对旧中国这样复杂广大的社会达到如此深刻的了解，怎么可能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彻底地解决了无数“社会学家”们难以触动毫毛的“社会问题”？如果我党的这些研究不能称为社会学，那岂不是对社会学本身的最尖刻的讽刺吗？所以，我们不但要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扎扎实实地把研究毛泽东思想同总结我党认识和改造中国现实社会的全过程及各个细节结合起来，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寻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根。

根据自己初步的学习和研究，我深深感到这个根所具有的

生命力。对比西方苏联，我感到万分激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用他们的智慧和鲜血为我们超越苏联和西方、建设高度科学性的社会学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而他们所创造的研究现实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和方法是迄今为止西方和苏联所缺乏的，正是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高度科学性的社会学原则。

当务之急的是，我们应有许许多多的人同心协力来发掘、研究这些社会学宝藏，使之学科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拟从四个较大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研究心得，作为引玉之砖。

二、洞察力和经验研究相结合：

理论、历史和现状的三结合原则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各种人提出了各种见解、分析和预测。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在“问题的根据”一节一开头就说道：“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⑤

当时我们的专业社会研究机构和情报机构以及设备和技术手段肯定不如国民党当局的“发达”，然而，“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⑥这里所包含的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毛泽东同志总是教育全党要在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上抓住要点，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就在革命呈现低潮的情况下，党内出现了对前途悲观主义的错误估计时，他在《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一文中写道：“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下列四点，这四点是通过现象洞察本质的关于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的特点。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洞察力。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有人简单地采用现代化的“民意测验”“态度量表”以及单纯的统计，能否得出毛泽东同志的结论、产生正确的革命策略呢？其实，当时一些同志虽然不是用这类方法来观察形势，但方法论却同样是经验主义的，因此，“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毛泽东同志认为“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⑦这里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尖端问题。这就是社会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就是直接经验和理论洞察的关系问题。换成具体的社会学的语言，就是描述和分析具体现象的经验研究本身能否直接产生理论认识，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说，单纯经验研究总是有缺陷的，那么缺陷何在，如何克服呢？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从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深入地提出过和解决了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

他首先反复地提出了注重马列主义研究、注重现状、注重历史三方面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如何才能洞察社会的实质？不是因为所谓“直觉”、“先哲”的唯心的东西，只是因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矛盾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对于客观辩证法的理论认识，“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⑧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在根本上使我们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方法”一节的第一点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⑨不仅用它来分析社会的结构，而且用它来考察事物的变化。他提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分析事物诸矛盾的方法。估计事物的趋势，在于详细地察看引起这种事物或现象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⑩正因为各种矛盾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那么，现状只是矛盾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事物的全貌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暴露其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各个方面，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因此，“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⑪不要割断历史。毛泽东同志认为“事情的全体”是“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事情的本质”是“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详见《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对抗战战争的预测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眼光和辩证眼光——历史过程中的日本和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等等。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估计，来自于“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的革命力量发展的必然性（矛盾过程一方发展的必然性）。⑫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是极为先进的。实证社会学向来重逻辑轻历史，在人们的批评下，虽也提出了解“历史背景”的问题，一些反实证主义的哲学社会学家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过去”和“现在”的溶合问题。但在社会研究方法论中，明确把事物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综合地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并始终把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同志对社会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三、理论如何同经验研究相统一：

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来观察现象，这是前提，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世代的人的社会研究都不是孤立的，我们每一项具体研究都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长链中的一节。因此，就革命和战争问题来讲（建设，包括城市、家庭、教育都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学习“国际经验”的问题。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具体的理论和结论，又包括各国无产阶级的成功经验。他说：“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③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即使在中国，别次战争，别的地区的经验或理论法则也不能搬到该时该地的战争或其他事情中来。反过来，毛泽东同志也反对忽视别国经验和理论的倾向（更不必说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了）。中国革命就是在马列主义一般理论（包括阶级划分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等具体方面）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才得以成功的。这两者是如何相联结的呢？

这就是“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方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的放矢，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则强调“从国内、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

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做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这两方面的中介就是调查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⑭

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是“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⑮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⑯这一过程是被马克思称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

社会调查——详细系统周密地调查研究具体社区的历史和现状，对世界而言是中国，对全国而言是省，对全省而言是县，对全县而言是区，是了解具体矛盾的唯一途径。没有这种正确的调查就不可能把普遍的理论变为适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政策，就不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

毛泽东同志不但在总体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在具体方法上进行了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具体方法是这种方法论的体现。他在“方法”中说：“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事物时”，如观察延安，第一步观察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通过这三步，分析又综合，其中包含小分析和小综合，得出与开始看见的整个的延安不同的“整个的延安”，“现在他对延安就有

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⑮他指出，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采用的方法。这个具体是科学的整体性的具体认识。“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⑯在这个过程中，普遍规律变为具体的规律，而具体规律同时又发展了普遍规律，产生着新的理论。调查研究的这个全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有系统的阐述。

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同志对社会学思想的杰出贡献。近年来，西方愈来愈多的人看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严重脱节的现象，一些严肃的社会学家在理论上强调“中间理论”的重要性，并主张“社会学理论必须通过适合于有限范围的社会资料的专门理论和适合于联合各组专门理论的更为一般的概念图式的演进来提高”（默顿），^⑰受到了各国许多社会学权威的响应。但这种说法片面强调了自下而上产生理论，只是西方缺乏正确的总体理论的表现，而这种自发产生的专门理论事实上使西方社会学概念和理论的混乱有增无已。苏联近年来也越来越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苏联哲学学会副会长M·米丁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里亚布什金也提出“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学认识中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苏联缺乏我党长期具有的社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至今要么强调总体规律在局部的表现，要么感叹“更确切地说，从经验数据中挑选出概念结构的方法和形式，还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⑱总的说，还是片面强调自上而下的演绎和解释。他们这些言论使人感到，他们并没有把握住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生动的辩证关系。

四、调查研究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在同运动着的事物的实践关系中进行研究

毛泽东同志把握住了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动态的辩证关系。

他从理论高度提出了社会认识的根本任务：“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②认识世界为了改造世界，只有改造世界才能认识世界，为了认识世界，人还必须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这里包含着一连串深刻的理论问题。

第一，由于社会的客观现实具有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性质，认识主体——调查者具有各种不同的阶级立场，同被调查的事物处于一定的关系，因此，调查者只有用先进阶级的世界观——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起来，才能认识社会的客观事物。而具体个人的主观世界的这种改造又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

第二、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是能动地改造社会的阶级，认识社会的活动是在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实现的，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单纯自在的问题，而是我们实践的对象。而无产阶级也不是自在的阶级，它组成了先锋队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组织的实践活动。因此，社会研究也好，社会学也好，都不是少数人的学术活动。如果要有真知，必须依靠“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②这种实践集中地体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及其行动的过程。“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

政策相联系的”。②站在能动地改造社会的先进阶级立场上进行社会学研究是我们的社会学区别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之点。这个根本之点不但在总体方法论上，使我们的社会实践的研究同实用主义强调“实践”“实验”的似是而非的社会研究划清了界线，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技术。

第三、由于研究主体和客体处于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中，而“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④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单纯依靠若干“科学方法”和研究程式就能保证获得对所研究问题的科学认识。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密切跟上事物的运动、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而且要清醒地看到：“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⑤

这些理论问题对具体社会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们指明了克服盲目崇拜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调查技术至上的西方社会学弊病的途径。使我们在学习所谓没有阶级性的调查技术时，抵制资产阶级方法论的侵袭。对于具体社会学研究而言，它们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原则。

第一，要充分重视研究主体——活生生的、有着自己阶级立场、思想水平和专业素质等特点的研究人员在研究社会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⑥一切调查技术、测量手段、统计方法或分析模式，都要通过研究者主体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过，在方法问题前面还有一个态度问题，有时候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态度不对，他号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回答：“到底如何才能使

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这一问题的三点的 第一点 就是：“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而下列两点都在讲具体方法之前，先讲了“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⑲也就能理解，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的技术”这整整一节的七点中，何以有三点是关于调查者本身的：“(5)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6)要深入。……(7)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可行的”。^⑳即使对于收集整理材料的具体过程，也不是死板地按照某一程序，而要把方法和研究主体在具体社会研究中积累的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收效。毛泽东同志说：“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㉑

第二，由于人对一事物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要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全过程中才能最终完成。而我们的认识又必须赶在全部这类现象(例如生产责任制在全国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展之前，获得比较科学的认识，这样才能有效地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不至于成为马后炮。这就产生了“试点”、“蹲点”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作为毛泽东调查方法重要内容的典型调查，不但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什么小农生产方式，也不只是具体方法中的一种而已，而是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社会的根本方法之一。近年来西方日本许多社会学家鉴于普查式的经验方法的浅薄和无能，力主对社会典型人物(不是名人)和单位进行“日常生活史”、“个